



典籍增輝——中國大陸學界整理宋代典籍的回顧

黃寬重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一、前言

本文旨在檢討四十年來中國大陸學術界整理宋代典籍的情形。四十年來，中國大陸的學者對中國史的研究有推進作用，最近十年來的成績尤其值得肯定。但史學研究的資源是典籍資料，要評介四十年來中國大陸學術界對中國文史哲的研究成果，瞭解其典籍整理情況是重要的關鍵。中國大陸收藏豐富的中國古籍，整理古籍有其傳統，政府又重視此一工作，加上其政治環境利於進行集體合作，因此典籍整理的成就輝煌，不僅為研究者帶來便利，更為其學術研究奠下良基。今天，全世界研究中國史的學者都或多或少地受惠於其整理的典籍，然而對其整理情形、變化、成果以及整理所引出的問題，並未引起學者的注意，是令人遺憾的事。

筆者研究宋代史事，比較重視版本、目錄，對大陸學者在典籍整理及研究的成果多所仰賴，也注意其整理情形。近年來曾多方蒐集中國大陸關於宋代典籍的點校、影印等出版資料，以及學者對宋代典籍所作的版本、校勘、補遺、考證等研究成果及檢討。因此，擬從典籍的整理、出版、點校檢討、補輯、版本、及新文獻的發現與考訂等方面進行討論。本文除前言、結語外，共分四節，第二節〈典籍整理與出版〉，討論四十年來，中國大陸出版宋代典籍中點校與影印的情形；第三節〈點校檢討〉，對大陸已出版點校的宋代典籍所顯現的問題，加以檢討；第四節〈典籍補遺〉，一方面介紹大陸學者補輯宋代典籍資料的成果，一方面以個案的方式介紹若干重要補遺的專書；第五節〈新文獻、新版本的介紹與典籍考訂〉則介紹四十年來中國大陸所發現若干研究宋代的重要文獻與版本，以及學者考訂宋代典籍的重要成就。由於時間匆促，所利用的文獻，仍未完備，目前的整理工作尚屬初步階段，加上個人興趣、學識的限制，所討論的問題仍有許多缺失，敬請指教，以待將來進一步補正。

二、典籍整理與出版

本節所討論的，是經整理出版的宋代典籍，包括點校、補遺與影印三方面，而以點校為主。四十年來，中國大陸的學術發展受政治運動的影響很大，典籍整理雖然意識型態的色彩較淡，但從整理活動的變化，也能反映政治影響的深入。從1950年中共「建國」迄今，典籍整理工作，可分成三個階段：1950—1965年是奠基期，1966—1979年是中挫期，1980年起是茁壯成長期。這一點從古籍整理的數量可以得到證明。據《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的統計，從1950年至1988年的40年中，整理出版的古籍共有4,722種。其中，1950—1965年有1,120種，占總數的23.7%，1966—1979年共有198種，占4.2%，1980—1988年則有3,404種，占72.1%。宋代典籍的整理出版情況也能反映此一情況。

(一)奠基期(1950—1965)

1954年，毛澤東交付給吳晗二項重要的學術任務，其中一項就是標點《資治通鑑》，這是大陸學術界合作整理古籍的第一步，1956年2月點校本《資治通鑑》出版，接著籌劃二十四史的點校計畫。1958年，為了有計畫、有組織、有步驟地對古籍加以整理出版，中共國務院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小組，由齊燕銘負責，指定中華書局為古籍出版規劃小組的辦事機構，經多次討論，於1960年製訂了〈三年至八年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點規劃〉草案。這個草案除了擬定出版重要古籍1,450種外，還對整理、出版古籍的方針和做法，以及不同讀者閱讀的各類古籍，都提出了明確的意見和具體的要求。從此古籍整理工作走上正軌。到1966年規劃中的重要項目大體完成。總體看來，這一時期出版的古籍，質量俱優。

這一時期，一共出版了三十餘種宋代典籍。研究宋代比較重要的史籍，如《宋會要輯稿》(1957)、《永樂大典》(1960)、《宋朝事實》(1955)、《王文公文集》(王安石著、宋版)(1962)，都相繼影印出版。點校的書籍包括《夢溪筆

談》(1956)、《雲麓漫鈔》(1958)、《霽山集》(1960)、《能改齋漫錄》(1960)、《葉適集》(1961)、《蘇舜欽集》(1962)、《李清照集》(1958)、《范石湖集》(1962)、《揮塵錄》(1962)、《宋大詔令集》(1962)、《東京夢華錄》(外四種)(1962)、《包拯集》(1963)、《宋論》(1964)、《續資治通鑑》(1964)、《通鑑紀事本末》(1964)、及《全宋詞》(1965)。箋注的著作有《姜白石詞編年箋校》(1961)、《稼軒詞編年箋注》(1963)、《東京夢華錄譯注》(鄧之誠, 1959)。整理的資料有朱士嘉《宋元地方志傳記索引》(1963)、蘇金源與李春圃編《宋代三次農民起義史料匯編》(1963)等。這些書籍都是研究宋史的重要資料。

(二) 中挫期(1966—1979)

從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之後，所有的學者面臨被下放批鬥的命運，學術研究被迫中斷，古籍整理也難以為繼。1966至1973年的八年間，全中國古籍整理出版的只有19種，其中並無宋代典籍。1974年以後古籍整理活動雖然局部恢復，宋代典籍有十餘部相繼點校出版，如：《陳亮集》(1974)、《陸游集》(1976)、《宋史》(1977)、《宋史紀事本末》(1977)、《學習記言序目》(1977, 二冊)、《容齋隨筆》(1978)、《老學庵筆記》(1978)、《龍洲集》(1978)、《蘆川歸來集》(1978)、《李清照集校注》(1979)、《續資治通鑑長編》2—6冊(1979)。這些書籍的出版有二點現象值得注意：一是點校與出版的時間相去甚久，這主要是受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如王仲聞校注的《李清照集》，於1964年已排版，卻延到1979年才出版，而王仲聞則於1969年逝世，竟無法親睹一生辛勞結晶的出版。《宋史紀事本末》由河北師範學院承擔點校，於1966年完稿，也延到1977年才出版。其二是書籍的《出版說明》中充滿濃厚的政治色彩，這時期出版的南宋文集如陸游、陳亮、劉過等人和辛棄疾一樣都屬主戰派，最早出版的《陳亮集》更是明顯的例子，編輯者在《前言》中明白指出：

陳亮一生反對道學，同以朱熹為代表的道學唯心主義進行了堅韌的戰鬥，揭露了道學家們的虛偽、腐朽的反動本質，批判了大地主階級頑固派投降主義路線，堅持抗金統一，是我國歷史上南宋時期一位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

把陳亮說成一個主戰、反道學的法家代表者，這書的出版正和那時期儒法鬥爭的政治運動相契合。此外，在點校本《宋史》和《宋史紀事本末》的出版說明中，同樣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及儒、法鬥爭的論點去批判這二本書。說《宋史》除抹煞階級鬥爭，吹捧帝王將相，宣揚天命論等唯心史觀外，更始終遵循程朱理學思想，「深刻反映封建社會後期，反動統治者乞靈於孔學，特別是道學來維護封建

統治秩序的企圖，反映了整個地主階級思想體系，特別是唯心主義史學的反動性與腐朽性」。總之，「《宋史》推崇道學，以道學為立論的標準，在史學上是極端反動的歷史唯心主義」。在《宋史紀事本末》的《出版說明》中，指出這本書是按朱熹那種唯心主義歷史觀來編寫史書，充分暴露它極端反動和腐朽的性質，認為書中有不少落後、反動的觀點，如敘述楊么與劉豫聯絡即是誣蔑農民起義英雄。

此時也出版由郭紹虞撰述的《宋詩話考》(1979)，則是舊作增訂成書的。

文化大革命期間，古籍整理小組停止工作，古籍整理除了點校出版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外，大部分工作都陷於停頓。

(三) 茁壯成長期(1980—)

四人幫倒台後，古籍整理工作逐漸恢復，一些文革前已經付型而未及付印的古籍陸續出版，1980年全中國整理出版的古籍已達138種，是1960年以後出書最多的一年。1981年5月和7月，中共領導人之一的陳雲二次對古籍整理與出版作出重要指示，其後在共黨中央及國務院的指示下正式恢復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1982年春，討論製訂了1982年至1990年的古籍整理規劃，選了三千一百餘種古籍。隨著改革開放及經濟發展，對古籍的整理與出版不僅更有計畫，組織益趨完善，同時擴大整理出版的領域，如歷史文獻已由正史擴及野史、筆記小說和罕見的史書。出版的數量日益增加，至1988年已達3,404種，約為前三十年的2.6倍。

宋代典籍的整理正反映上述情況。筆者初步統計自1980年到1989年上半年，宋代典籍點校出版者共有187種，再加上1990年的《蘇轍集》，為188種。比較重要的點校典籍有：

- 1980年 《夢梁錄》、《于湖居士文集》、《陸九淵集》、《梅堯臣集編年校注》(3冊)、《東齋紀事》。
- 1981年 《清真集》(吳則虞點校)、《重輯李清照集》(黃墨谷輯)、《李觀集》、《夷堅志》、《宋朝事實類苑》、《歸田錄》、《東坡志林》(中華書局)、《滙水燕談錄》、《默記》、《游宦紀聞》、《舊聞證誤》、《武林舊事》、《燕翼詒謀錄》、《春明退朝錄》。
- 1982年 《蘇軾詩集》、《程史》、《陳與義集》、《龍川別志》、《龍川志略》、《北夢瑣言》、《詩林廣記》。
- 1983年 《宋詩紀事》、《邵氏聞見錄》、《雞肋篇》、《春渚紀聞》、《鶴林玉露》、《周邦彥集》(蔣哲倫)、《東軒筆錄》、《鐵圍山叢談》、《泊宅編》、《青瑣高議》、《東坡志林》、《仇池筆記》(華東師大)。
- 1984年 《宗澤集》、《宋刑統》、《齊東野語》(張茂鵬)、

- 《石林燕語》、《賓退錄》、《徂徠石先生文集》、《後村詩話》、《曾鞏集》、《北宋經撫年表》、《南宋制撫年表》、《益州名畫錄》、《圖畫見聞志》、《五燈會元》、《湘山野錄·續錄》、《王壺清話》、《畫繼》。
- 1985年 《朱淑真集注》(冀勤)、《劍南詩稿校注》、《永嘉四靈詩集》、《增訂湖山類稿》、《中興小紀》、《契丹國志》、《青箱雜記》、《梁溪漫志》(金圓)、《甕牖閑評》、《考古質疑》(李偉國)、《元豐九域志》、《桂海虞衡志校補》(齊治平)、《直齋書錄解題》、《宣和畫譜》。
- 1986年 《蘇軾文集》、《林和靖集》、《樵歌注》、《劉辰翁集》、《文天祥全集》、《雪磯叢稿》、《陶淵明年譜》、《大金國志校證》、《司馬光奏議》、《蘆浦筆記》、《塵史》、《獨醒雜志》、《靖康細素筆記》、《宋稗類鈔》、《松漠紀聞》、《吳郡志》、《吳郡圖經續記》、《桂海虞衡志校注》(嚴沛校注)、《金石錄校注》、《宋詩抄》、《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四冊)、《朱淑真集》(張璋)、《朱子語類》。
- 1987年 《後村千家詩校注》、《新編分門古今類事》、《珠玉詞》(吳林杼)、《歐陽修詞箋注》、《名公書判清明集》、《史略校箋》、《唐語林校正》、《齊東野語》(朱菊如等)、《梁溪漫志》(傅毓鈴)、《宋人長江遊記》(《入蜀記》、《吳船錄》)、《桂海虞衡志輯佚校注》(胡起望等)、《陳亮集》(鄧廣銘)、《宋元學案》、《野客叢書》、《胡宏集》。
- 1988年 《全宋文》、《六一詞》、《山谷詞》、《于湖詞》、《後村長短句》、《白石詞》、《花外集》(楊海明)、《花外集》(吳則虞)、《梅溪詞》(雷履平等)、《竹山詞》、《宋元四大戲文讀本》、《宋詩紀事續補》、《冷齋夜話》、《風月堂詩話》、《環溪詩話》、《靖康稗史箋證》、《稽古錄》(吉書時)、《稽古錄點校本》(王亦令)、《癸辛雜識》、《折獄龜鑑譯注》(劉俊文)、《宋東京考》、《雲笈七籤》、《宋高僧傳》、《學林》、《蘇魏公文集》、《東萊博議》、《海岳名言譯注》、《疑獄集、折獄龜鑒校釋》(楊奉琨)。
- 1989年 上半年有《樂章集》、《珠玉詞》(胡士明)、《小山詞》、《東坡樂府》、《淮海居士長短句》、《東山詞》、《片玉詞》、《張舜民詩集校箋》、《漱玉詞》、《斷腸詞》、《蘆川集》、《放翁詞》、《稼軒長短句》、《龍川詞》、《龍洲詞》、《梅溪詞》(方智苑)、《須溪詞》、《山中白雲詞》、《萍州漁笛譜》、

《無弦琴譜》、《包拯集編年校補》、《四朝聞見錄》、《事物紀原》、《顛國金陀粹編續編校注》、《後山談叢》、《萍州可談》以及《考古質疑校證》(陳大同)。

1990年 《蘇轍集》、《守城錄注釋》。此外，《續資治通鑑長編》至1990年已出版至20冊。

目前對宋代典籍整理最具規模的工作為《全宋詩》和《全宋文》的編纂。

《全宋詩》的編纂計畫，由北京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推動(孫欽善、傅璇琮主編)。這項編纂工作首先對近600種傳世的宋人詩集進行整理，包括校勘、補遺、辨偽。校勘上先對專集考清版本源流，選擇善本、足本為底本，及確定有代表性的本子為參校本，異文的出校以校是非為主、兼校異同；在辨偽上，經考證確認為偽作誤收者一律刪歸存目，證據尚欠充足，兩見存疑時，則加按語說明，不輕易刪除；在輯佚上一方面對有集作家的詩，進行補遺，另一方面對無集作家的詩進行輯集。其編輯方式，第一步先編為正編，第二步就續有所得者輯為補編。目前已完成第一步輯集工作，並輯得無集作家8,800多人，加上有集的591家，共計9,300多家。在作者傳記資料的稽考和小傳的撰寫，力求翔實有據。至1991年已出版《全宋詩》5冊。

《全宋文》的編纂計畫，由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負責(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共約三、四千萬字，為《全唐文》的三、四倍，輯錄的範圍，時間上從西元960到1279年為斷，空間上凡曾仕於宋及曾居於宋地方者均視為宋人，大理、吐蕃作家之文則收入附錄。所收為詩、詞、謠諺、小說以外的一切散文、駢文、辭賦均屬之，包括有賦、制、誥、詔敕、策問、奏議、策、牘、表、露布、移文、啓、書、論、議、序、跋、疏、判、連珠、頌、贊、銘、箴、傳記、雜說、諡議、碑文、墓表、墓志、行狀、祭文、祝文、醮詞等，集外單行的宋代學術著作、詩話、筆記的作者序跋、和其他宋人序跋皆收。輯佚工作共查書七千餘種，拓片法帖三千餘帙，同時進行文集的點校工作。全書預定出版100冊，目前已出25冊。

這十年來，中國大陸影印出版的宋代典籍也很多，根據目前不完整的統計，從1980年到1989年上半年，共影印162種，其中比較重的是：

- 1980年 《唐鑑》。
- 1982年 《全芳備祖》、《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太平治蹟統類》、《慶元條法事類》、《廣韻》。
- 1984年 《後山居士文集》、《雙行精舍汪水雲集》(王獻堂輯校)、《韻語陽秋》、《武林舊事》、《夢梁錄》、《類編》、《廣陸先生文集》、《松隱集》、《漫塘文

- 集》、《永樂大典》(續印本)、《集韻》。
- 1985年 《西昆酬唱集》、《淮海居士長短句》、《文天祥全集》、《錢塘遺事》、《蜀鑿》、《范文正公文集》、《新定三禮圖》、《咸淳本左氏百川學海》、《甲申雜記》、《聞見近錄》。
- 1986年 《詩淵》、《歐陽修全集》、《蘇東坡全集》、《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陸放翁集》、《虞初志》、《方輿勝覽》、《沈忠敏公龜溪集》、《陵陽集》、《吳興志》、《南豐曾子固先生集》、《切韻》、《畫續》、《五代名畫補遺》、《壽親養老新書》、《續資治通鑑長編》。
- 1987年 《秦少游黃魯直詞合刊》、《宋本切韻指掌圖》、《宋史翼》、《通鑑紀事本末》、《大事記》、《宋名臣言行錄》、《通志》、《金陀粹編》、《文獻通考》、《輿地紀勝》、《小學紺珠》、《嘉祐集》、《忠文公紀事實錄》、《三朝北盟會編》、《郡齋讀書志》、《玉海》。
- 1988年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棠蔭比事》、《職官分紀》、《鉅鹿東觀集》、《宋拓淳化圖帖》、《朱文公訂正門人蔡九峰書集傳》、《武經總要》、《東觀餘論》。
- 1989年 《元豐類稿》、《宋本歷代地理指掌圖》、《宋會要輯稿補編》、《記纂淵海》、《事類賦》。
- 1990年 《歷代制度詳說》。

這些影印的典籍，或講求版本、或有其重要性，都對宋史研究提供重要原始資料。其中《永樂大典》(續印本)、《詩淵》及《宋會要輯稿補編》三種，對宋史研究尤為重要，但這三部書都是新近發現重要史料，對補遺功用尤大，下節分別介紹。

三、點校檢討

本節所討論的點校，是指中國大陸學界整理宋代典籍的斷句、標點和校勘三項工作。

古籍整理表現一代的學術水準，特別是語文程度。唐李匡義《資暇錄》引稽下諺云：「學識如何觀點書」。四十年來，經點校出版的宋代典籍約達二百種。由於點校者利用各種版本加以比勘，並以其專業素養加以斷句、標點，不僅減少錯誤，增加閱讀和研究上的便利，甚至對文化的保存與發揚，都具有長遠性的貢獻。不過，古籍整理是一項相當艱鉅的工作，需要有無比的恆心和耐心，同時涉及到文、史、哲、經學及版本、目錄、文字、訓詁、校勘等多方面的學問，需要多方面的學養，因此典籍點校者的辛勤和艱苦應受到敬重。

由於中國大陸學者點校的成果既豐富又卓越，長期以來，廣受海內外讀者與研究者的信賴，對其出版的點校典籍，往往毫不猶豫地直接引用，然而如前所述典籍的點校牽涉到極為廣泛的學術領域，很難做到十全十美，就如集合多位著名史學家點校的《資治通鑑》，出版後，尚發現數以千計的點校錯誤，因此，我們對點校成果敬重之餘，卻不能冒然地全盤接受，同時更需要在使用時不斷地予以完善，使點校的典籍愈臻完善。

大陸學界既看重典籍的點校工作，又有多方面的人才，為避免因點校錯誤而影響到典籍的內容，甚至研究品質，經常有人對已出版的點校典籍進行檢討，指出疑誤之處。此一檢討，對典籍、點校者和閱讀者都有極大貢獻。

目前筆者檢索到大陸學者對點校出版宋代典籍的檢討論文共有83篇，其中討論《宋史》點校的問題有22篇，《續資治通鑑長編》7篇，《夷堅志》、《湘山野錄》、《蘇軾詩集》各3篇，《夢溪筆談》2篇，《東京夢華錄譯注》3篇，《玉壺清話》2篇，《程史》2篇，《金石錄校注》2篇，《宋詩話輯佚·古今詩話》2篇，《宋史紀事本末》2篇，餘如《周邦彥集》、《夢梁錄》、《曾鞏集》、《直齋書錄解題》、《劍南詩稿校注》、《五燈會元》、《春渚紀聞》、《大金國志校注》、《石林燕語》、《全宋文》、《癸辛雜識》等27種書各一篇。

在檢討各別典籍的點校問題中，比較重要的論文，如梁太濟在三篇討論《續資治通鑑長編》點校的問題中，指出《長編》前80卷共發現點校失誤77處。林正秋則指出1980年出版的點校本《夢梁錄》，點校錯誤達百餘條，並舉出15個錯誤的實例。李裕民舉出《湘山野錄》點校9誤，《玉壺清話》點校10誤。薛正興則舉《野錄》和《清話》點校錯誤30例。鍾振振也舉《野錄》點校失誤6例。王邁指出《夷堅志》校語失誤10例。王鏌也舉《夷堅志》校勘17誤、標點15誤。曹濟平舉《直齋書錄解題》在考辨按斷上的問題1誤、底校有誤的問題2例、排印錯誤及失校1例。王樹民舉《宋史紀事本末》點校失誤55例，張新奎則列舉9例。鍾振振指出點校本《春渚紀聞》疑誤(一)在文句破讀上有30例，(二)文句當斷未斷有28例，(三)引號失標、誤標18例，(四)人名失標、誤標共28例，(五)地名失標、誤標17例，(六)書名號及其他專有名號失誤5例，(七)錯字失校2例。項楚舉《五燈會元》點校錯誤300處。白敦仁指出新版《陳與義集》點校問題十點共34例，包括(一)把五言詩點成七言詩5例，(二)把七言詩點成散文1例，(三)書名號誤8例，(四)人名號誤3例，(五)引號誤1例，(六)失校6例，(七)誤校2例，(八)原本不誤，點校本誤2例，(九)因失校引起的標點錯誤5例，(十)其他標點錯誤1例。楊武泉在《評桂海虞衡志校補》一文中，指出點校者

齊治本對本書的貢獻有三點，但缺點有七：包括(一)校本有遺：未利用四庫全書本校勘，(二)校核欠精，(三)斷句有誤 2 例，(四)條目不顯，(五)注有漏缺，(六)注有疑誤，(七)輯佚較疏。王鎮舉新校《齊東野語》誤標 4 例。徐規舉出《全宋文》第一冊有 108 誤。呂叔湘在《標點書不可掉以輕心》文中指出《揮塵錄》點校失誤 12 例。謝恩焯指出《周邦彥集》點校失誤 11 例。劉石指出《蘇軾詩集》標點失誤 13 例。至於綜合性的點校問題則龔延明先後為文指出有關官制點校的問題，舉出宋代典籍點校中有關官制之誤有 42 例，呼籲重視官制問題。冒懷辛於《檢討中華版〈史料筆記叢刊〉訂正》文中舉出《齊東野語》失誤 9 條、《鐵圍山叢談》5 誤。王鎮：〈宋人筆記點校刊誤〉中舉出《春明退朝錄》、《泊宅編》等書之誤標 7 例、失校 5 例。

此次姑舉六例為證：

1. 《全宋文》第一冊頁 147 行 2。

原文：頗聞諸州州司馬步院置獄，外置子城，司獄諸司亦輒禁人，甚無謂也。

改正：頗聞諸州州司，馬步院置獄外，置子城司獄，諸司亦輒禁人，甚無謂也。

2. 《春明退朝錄》。

原文：開寶八年十一月，江南平留，汴水以待李國主舟行。

改正：開寶八年十一月，江南平，留汴水以待李國主舟行。

3. 《曾鞏集》卷 49〈三司〉。

原文：鹽鐵戶部度支凡二十四，案吏千餘人。

改正：鹽鐵、戶部、度支凡二十四案，吏千餘人。

4. 《司馬光奏議》卷 37〈讀罷將官札子〉。

原文：又每將下有部隊，將準備差遣、指使之類一十二人。

改正：又每將下有部、隊將，準備差遣、指使之類一十二人。

5. 《游宦紀聞》卷 5。

原文：是歲九月二十七日，惠州星華館思無邪齋書此，段玉山端殿，汪公應辰，刻先生手書於石。

改正：是歲九月二十七日，惠州星華館思無邪齋書此段，玉山端殿汪公應辰刻先生手書於石。

6. 《夢溪筆談》卷下 722 頁。

原文：其下又有貧四姓：如工、巧、純、陋是也。

改正：其下又有貧四姓：工巧純陋是也(工巧是工匠，純陋是人名)。

以上所述的點校討論及舉例，顯示點校的艱難，同時也提醒研究者利用點校本時要小心斟酌，不能過信所有的

點校本。

四、典籍補遺

中國大陸疆域廣闊，古籍蒐藏豐富，版本繁多。點校者，在校勘不同版本時，也常發現一些佚詩、佚文或被抽燬的文章，而加以輯錄，成為各種點校本的附錄。目前所見各種點校本的宋代典籍，都可以看到點校者的輯佚成績，如陳宏天、高秀芬點校的《蘇轍集》(中華書局，1990 年，4 冊)就在書後附有劉尚榮《蘇轍佚著輯考》一文，收蘇轍佚著古今體詩 19 首、奏議 23 首、祝文 1 首、敘引 1 首、記 1 首、銘敘 1 首、題跋 8 首、尺牘 21 首。而曾棗莊等人點校的《欒城集》(上海古籍，1987 年，3 冊)也在書後附有比四部叢刊本多 37 篇的蘇轍文章，更從《東坡集》、《永樂大典》、《播芳大全》等書，輯得蘇轍佚詩、佚詞、佚文 37 篇，共 74 篇。錢仲聯亦於《劍南詩稿校注》之後，附毛晉輯的陸游詩 43 首、及錢氏輯的詩 32 首與殘句若干。這些都可以看出點校者的用心和功力。

宋史研究者和文獻學家在輯遺上也貢獻心力。成冊的成果有：郭紹虞《宋詩話輯佚》(1981)、孔凡禮《全宋詞補輯》(1983)、孔凡禮《范成大佚著輯存》(1983)、欒貴明《四庫輯本別集拾遺》(1983)、《永樂大典》續印本(1984)、孔凡禮《增訂湖山類稿》(1984)、孔凡禮《沈括詩詞輯存》(1985)、胡起望等《桂海虞衡志輯佚校注》(1987)、陳智超《宋會要輯稿補編》(1988)、孔凡禮《宋詩紀事續補》(1988)等都是重要的輯佚成果。而其中又以孔凡禮的輯佚成果貢獻特別大。

上述諸書中，《永樂大典》續印本、《宋會要輯稿補編》、《范成大佚著輯存》、《四庫輯本別集拾遺》和《增訂湖山類稿》值得加以介紹：

《永樂大典》續印本 1960 年中華書局影印出版的《永樂大典》是 730 卷，此後 25 年間，中華書局多方調查和聯絡，在中國大陸的上海發現 3 卷，山東掖縣 2 卷，臺灣 5 卷，又向韓國找到 2 卷，美國 3 卷，西德 3 卷，西柏林 7 卷，日本 18 卷，英國 24 卷，共 67 卷，乃於 1984 年，以紅黑二色套印線裝影印出版，這就是續印本。續印本的《大典》有很多宋代史料，如卷 655、666 二卷中有南雄路志，專敘宋事，其〈進士題名〉欄記仁宗天聖 2 年(1024)至度宗咸淳 7 年(1271)南雄州保昌、始興二縣進士 45 人，特科自孝宗淳熙戊戌年(1178)戴覲以下 62 人，攝官自徽宗宣和 5 年(1123)葉如璋以下 12 人，都注明各人仕履，為它書所不載。其中〈山川〉、〈宮室〉及〈雜文〉各門，保存許多宋人詩文，〈官制〉門記知府以下各級官吏及品秩，〈兵房〉門記南雄營寨駐兵建制和人數，〈館驛〉門記各館驛位置和交通工

具的配置，可補正史本志之缺，有助於瞭解宋代嶺南州縣基層政治。8089、8090及19866各卷引司馬光《涑水記聞》甚多，內容頗與通行的聚珍本不同，其中8089卷有《綏州城錄》、《劉述上神宗論種諤、薛向城綏州罪狀》，及卷19866《嘉祐七年十二月庚子上幸天章閣》條，均不見於聚珍本。又以續印本與四庫輯本宋人別集核校，共發現別集遺佚者有44種，共計詩文二百餘篇，其中以卷7322、7324、7325三卷，保留宋吳泳《鶴林集》制詞165篇，均為四庫本所失收，又如范成大之文，在續印本中尚有不少佚文，可補孔凡禮所輯《范成大佚著輯存》。

《宋會要輯稿補編》陳智超於1981年在北京圖書館善本特藏部發現並加整理而成的，共80萬字。《補編》的資料，原是徐松輯《宋會要輯稿》的一部分，後被民初劉富曾當作複文而刪落的。1953年北京圖書館自舊書店來重閣購進兩捆稿件，有裝訂成冊，也有零散的。這些資料與今本《宋會要輯稿》的關係可分成二類，第一類為今本《宋會要輯稿》所無，而被劉富曾當成複文刪除的，約有十餘萬字，如《帝系》類的宗室雜錄中，今本缺孝宗淳熙十六年間的內容均在《補編》中，約萬餘字。又如《禮》類的「太一宮」、「上清宮」、「玉清昭應宮」、「太寧宮」、「景靈宮」五門共一萬五千餘字，也是今本《輯稿》所沒有的。第二類，確是複文，但情況各異，從來源說可分成二類，一是《宋會要》原來重複的，即同一內容分屬不同類門，因而產生重複，如市舶，既列入《職官》類的「市舶司」門，又列入《食貨》類的「市舶」門，今本《輯稿》保留的是《職官》類，屬於《食貨》類的則被刪除而見於《補編》中。另一類是《永樂大典》的重複，即同一內容，歸入不同的字韻而出現重複情形。這些複文，可以作為校補之用，如今本《輯稿》《食貨》15、16、17載北宋各州、縣、以至鎮、寨的商稅額是研究宋代商業財政的重要資料，但其中永興軍路的商稅額脫漏十四行，《補編》所收「商稅」門的複文，正可補今本的脫漏。

除《宋會要輯稿補編》外，王利器也對《宋會要輯稿》進行補遺的工作。

《范成大佚著輯存》范成대는南宋孝宗朝的名臣，經歷豐富，著作很多，他的詩集早在1960年就點校出版，但文章久佚。孔凡禮在傳璇琮蒐集的基礎上，從《永樂大典》、《黃氏日抄》、《歷代名臣奏議》、《宋會要輯稿》等書中，輯出范成大的文論凡135篇、詩9首、詞88首、殘篇若干，輯集而成的。這本書對研究范成大與南宋中期歷史，很有助益。

《增訂湖山類稿》汪元量著。汪元量，字大有，錢塘人，生於理宗淳祐元年（1241），約死於元仁宗延祐4年

（1317），享年約77歲。他是琴師，又是詩人、詞人，曾給事南宋宮廷，後隨宋三宮入大都，在北方逗留了很長的時間，一生經歷宋、元之交社會急遽動蕩的年代。他在作品中對南宋滅亡的歷史教訓作了無可奈何的小結；對權相賈似道之流的誤國，做了深刻的揭露；對元統治者殘酷折磨宋三宮的行徑，作了有力的控訴；對流落北方的宋宮人懷念故國的心聲，做了強烈的表達，其作品被譽為「詩史」，有著濃厚的歷史意義。原有《湖山類稿》為其友人劉辰翁所選，類稿與外稿共收詩380首、詞29首。孔凡禮又自《詩淵》、《永樂大典》等書中，輯出詩100首、詞23首，刊行《增訂湖山類稿》，有助於研究汪元量的詩及晚宋歷史。

《四庫輯本別集拾遺》《四庫全書》本的宋人文集中有不少輯自《永樂大典》，但由於四庫館臣編纂時不能盡心蒐集，因此，現存《永樂大典》中仍可發現不少四庫本別集所佚的資料，樂貴明即從現存《永樂大典》中輯出數十種四庫本別集所失收的文章達1,864條，刊成《四庫輯本別集拾遺》二冊，於1983年由中華書局出版。書中有許多研究宋史的重要資料，如吳泳的《鶴林集》一書、四庫全書本僅自永樂大典中輯出64條，樂氏所輯達464條，比四庫本多400條（多屬制誥）。

除輯成專書之外，也有研究者對個別典籍或人物的作品從事輯佚。筆者所見凡30例，如《宋史》，有陳柏泉與王海根補張雲、陳龍復、張鏗傳，李裕民輯補《夷堅志》30條，康保成補9條（不過程弘指出其中四條有問題），辛更儒補4條范成大佚文，齊民補5條。王瑞來和湯開建、陳文源都補輯《續資治通鑑長編》的佚文，孔凡禮補《陸放翁佚稿輯存考目》之外，用《詩淵》補辛稼軒詩、詞、《全宋詞》、《朱淑真詩》、《汪元量詩》及《宋詩紀事》等。此外，蕭東海補《楊萬里集》，龔劍鋒補《宗澤集》，來可泓補來廷紹佚詩，龔延明補《宋大詔令集》，王海根、樂貴明、劉文源補文天祥、謝翱的佚詩，而胡道靜、吳佐竹輯出沈括的《夢溪忘懷錄》數十條，李之亮所補輯《畫墁集》的資料約為原書的三分之一強。程毅中則輯宋人張君房《麗情集》所佚文獻。這些都是很有價值的史料。

五、新文獻、新版本的介紹與典籍考訂

宋代墓志資料由於考古發掘，大量出現，對人物傳記及增補史事極有價值，但數量龐大，須另文討論。本文則以介紹家譜，及其他發現的文獻資料為主。江西宋墓曾出土二部宋刻本的《邵堯夫詩集》，而神宗元豐7年（1084）底及徽宗崇寧4年（1105）《宋德應侯廟碑記》則為研究宋代陶瓷史的重要史料，司馬光《與范夢得內翰論修書帖》是有關

司馬光的重要資料，辛更儒利用《鉛山辛氏宗譜》補辛棄疾歷仕始末，張梅坤利用1979年發現南宋安定郡王趙伯溪及其家族墓志，介紹趙伯澤家族的興衰和史彌遠的廢立之變。夏星南利用1985年浙江長興縣發現《咸安韓氏家譜》介紹韓世忠及其家族，都是以新發現的家譜墓志來增補史實的文獻。此外，《永樂大典》中若干新資料也廣被介紹，陳香白從《大典》潮字號殘卷中發現宋元時代潮州史料，吳松弟更進一步討論《大典》「潮」字部中《三陽志》成書的時間。李偉國則介紹清人文廷式《純常枝語》中抄錄《大典》有關宋元史料。

近年發現的典籍，對研究宋代文學與歷史最寶貴的資料要算是明抄本《詩淵》，而最重要的文獻則是在宋刊本《王文公文集》的書頁背面上發現大量的宋人公文、書信等遺檔。

《詩淵》為明初人所編（編者姓名不詳），共25冊。此書約收五萬多首詩及近一千首詞，其中約有十分之二、三的詩不見於過去刊印或新印的古籍中，大部分的詞也不見於《全宋詞》、《全金元詞》中。因此，此書的發現與出版不僅豐富了中國文學，更是宋代文學的寶庫。宋人的詩在明代中葉以後，大量散佚，《永樂大典》雖然保存不少，卻十分分散，輯補不易，《詩淵》所輯資料最多又集中，是輯佚的淵藪。如《顧逢詩集》、易士達的《松菊寓言》、張明中的《言志集》、張埴的《情性集》等書，都已久佚，《詩淵》則保留易士達詩約70首、張明中詩60首、張埴的詩約90首。除此之外，《詩淵》尚保留許多沒有專集問世、社會地位低微、聲聞不彰的人的詩作。因此，這部書對研究宋詩的發展、瞭解宋詩流派及對宋代詩作的全面輯集與整理都有重要意義。同時，該書編於五百年前，所引用的書，有的是原刊本或較接近原刊本，對現存的一些古籍，是正訛補脫的依據，加上編者忠於原文，對引載的文字，首尾完整地抄錄，不輕易更動，保持了原作的容貌，其態度是嚴肅的。《詩淵》於1986年由書目文獻社出版。

這部書最早為孔凡禮發現並據此補輯了宋代詩、詞資料，如以《詩淵》補唐圭璋編《全宋詞》四百三十多首，輯成《全宋詞補輯》，也在《詩淵》中輯得宋末詩人汪元量的詩82首、詞21首。另輯得辛棄疾詩17首、詞3首，朱淑真詩14首。更據此輯成《宋詩紀事續補》。

《宋人佚簡》是宋代公私書札中被發現數量最多、最有價值的資料。這些資料是在宋刻本王安石《王文公文集》的書頁背面上發現的。王安石的文集到南宋通行的有杭州刻本的《臨川先生文集》和龍舒（安徽潛山）刻本的《王文公文集》二種。杭州刻本迭經元、明二朝修補，流傳最廣，近代公私收藏幾乎全是以杭州本為主的明代刻本。而《王

文公文集》全帙一百卷，南宋以後迄無翻刻，原刻本傳世的僅存二部，一部現藏日本宮內省圖書寮，存卷1至70共70卷。一部原藏清內閣大庫，光緒間為寶應劉啓瑞食舊德齋所得，除目錄二卷外，共有76卷，此書後為南通吳氏思學齋、吳興蔣祖詒諸家收藏，約於1984年轉歸上海博物館收藏。這部書用的紙都是南宋初期朝臣向洵和其子士裴輩利用舒州公庫舊牘的背面印刷的，因此留下許多當時資料，現存《王文公文集》各卷共941頁，背面有宋人公私書札的計有786頁，其中有20頁見於中華書局1962年影印本《王文公文集》附錄，其餘均未為世人所知。這批書札中有紹興32年（1162）或隆興元年（1163）的字樣。《宋人佚簡》於198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精印出版，該書內容約分四類：

（一）是向洵給人的書札。主要為致宣撫判府安撫留守中書舍人等人，有10通，33頁。

（二）是他人給向洵的書札。一共有葉義問、洪适、邵宏淵等60多人的書札，共296通，計637頁。

（三）是當時的公文，計28件，41頁。發文的多屬舒州的隸屬機構向舒州使府報送《需如冊》的申聞狀，及天慶觀、興化禪院為開啓天申聖節祇候朝拜的申聞狀。

（四）酒務帳目，共30件75頁。是舒州本城酒務買賣的收支帳目，起自紹興32年12月15日至次年（隆興元年）正月7日，帳目的數量每日1至4頁不等，並有朱筆標目。首列每日總收入金額，再分為舒州在城酒務收入、舒州衙西店賣酒收入二項，其餘為人工、物料開支，上繳稅額等明細帳目。另有舒州衙西店的《酒務則例》，監在城酒稅官員申報的《稅務須知》等。

四十年來，中國大陸發現宋、元版書籍很多，文獻整理也探索版本源流，從而選擇善本做為點校底本。單篇介紹版本及版本源流的論文相當多。隨著經濟發展，出版興盛，許多研究宋史的宋元版書相繼影印出版，豐富了研究資源。影印書中值得介紹的有龍舒本《王文公文集》、《全芳備祖》、和《記纂淵海》三部。

《王文公文集》是王安石著，共一百卷。如前所述，王安石的文集在南宋以後杭州刻本的《臨川先生文集》較為通行，龍舒本自南宋以後迄無翻刻，原本傳世的僅有二部，一部現存日本宮內省圖書寮，存70卷；一部原藏清內閣大庫，後為寶應劉啓瑞食舊德齋所得，除目錄外，存卷1—3，8—36，48—60，70—100共76卷。傅增湘曾自食舊德齋借攝成玻璃片。1962年，中華書局利用傅增湘所攝玻璃片及北京圖書館所藏日本宮內省照片補足一百卷影印出版。龍舒本與杭州本所收文獻互有出入，可以互補。

《全芳備祖》為世界上最早的植物辭典，共著錄307種植物名稱，是南宋陳詠（景沂）編輯，祝穆訂正的。中國

大陸有二十種以上抄本，卻未見刻本流傳，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有刻本殘卷。經日本農業經濟史家天野元之助等人的斡旋，中國大陸的農業出版社向日本攝得全部資料，配以徐乾學積學齋復抄本，於1982年影印行世。

《記纂淵海》編者潘自牧，浙江金華人，生卒年不詳，與《山堂羣書考索》的編者章如愚同為1196年進士。全書共22部，1,195門（原序稱22部1246門，誤）。潘自牧詳于纂言，不主紀事，凡稱引之書均注明出處。而且本書成書較早，采摭諸書多係古本，不妄改竄，是校勘、輯佚的好資料。中華書局據北京圖書館和遼寧省圖書館所藏三個宋本，選其原刻部分，配成共195卷的足本，於1988年影印出版。這是一本可以與《羣書考索》相比美的類書。

除影印外，經點校出版的宋代典籍中有二部書值得加以介紹，一是增訂本《陳亮集》，一是《名公書判清明集》。

《名公書判清明集》是一本研究南宋後期社會、經濟，特別是法制的重要史料，向為學界所重視。以往只有刊行日本靜嘉堂所藏的宋殘本。198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宋遼金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員，在北京圖書館發現了10卷的明刻本，後來又在上海圖書館找到14卷的明刻本，這一刻本為宋殘本的4倍，是南宋晚期歷史研究很重要的史料，經點校後於1987年由中華書局出版。

《陳亮集》陳亮是南宋孝宗時代的名學者，著作豐富。他死後，作品被編輯成40卷的文集和4卷的外集，刊行于世。不過，這個本子到明朝中葉以後，已不完整。明成化年間，永康人朱潤、汪海以殘帙的《龍川文集》和《外集》合併，改編成30卷本，正式刊行，這是1974年點校本《陳亮集》的底本。後來，美國學者田浩(Hoyt C. Tillman)在臺北中央圖書館找到宋刻本《圈點龍川水心二先生文粹》(44卷)，鄧廣銘利用宋刻影本與明成化刊本比對，乃以成化本為底本，增收《二先生文粹》中《策問》三卷、《漢論》五卷、《任子宮觀謀試之弊》、《人法》二文，《永樂大典》殘卷中《代妻父祭弟茂恭》、《代妻祭弟何少嘉》二文，刪除元人所作《後杜應氏家譜序》一篇。此增訂本於1987年由中華書局出版。本書對研究陳亮思想及南宋中期史事極有幫助。

典籍文獻的考訂，包括辨偽、補正、訂誤。《宋史》成書倉促，疏漏甚多，向為學者所批評，因此，考訂糾正《宋史》失誤的論著甚多，目前所見的論文共有62篇，多半屬人物、時間的考異。其中，何忠禮《宋史立傳人物登科年代證誤》一文，指出在《宋史》立傳人物中，由科舉入仕者共1,250人，而《宋史》只記470人，其中至少有近40人的登科年代顯然有誤。點校本雖然訂正了張焜、袁韶，並指出朱倬、陸秀夫、周端朝的登科年代有誤，其餘諸人均失

校。作者則考訂了陳堯叟、史浩、周必大等29人的正確登科年代，指出張莊、章誼、別之傑、王翊、李亘等五人有誤，唯史料不足，未能確知其登科年代。對《宋史》考訂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顧吉辰的《宋史比事質疑》(1987)。而龔延明新著《宋史職官志補正》(1990)一書，對點校本《宋史·職官志》所呈現標點、校勘、乃至史實脫漏、失誤均詳加考訂。全書凡48萬字，是研究宋代制度史的重要參考資料。何忠禮著《宋史選舉志補正》(1992)亦已出版，陳樂素傾四十年心力的《宋史藝文志考證》也將整理出版。

對宋代其他典籍考訂的文章也很多，如李裕民補江少虞編《宋朝事實類苑》引書的出處156條，糾正其引書謬誤凡26條。徐俊則指出《春渚紀聞》作者王蘧的生平，出于王洋《東牟集》卷14《隱士何君墓表》，知約生于1078年，死于1145年，約享年69歲。崔文印、汪紹楹、崔富章均考訂《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的作者是廖瑩中，不是舊說岳珂。聞人軍的《宋〈因話錄〉作者與成書年代》一文，則指出《因話錄》的作者是曾三聘而非曾三異，約作于1200年左右。王智勇於整理《全宋文》時發現七則宋代文章的作者與繫年有問題，而予以考訂。費君清和孔凡禮都利用《永樂大典》中宋人詩文資料進行考訂；費君清考異南宋詩人姓名9則，孔凡禮則考訂出十七部宋代詩文集的作者。王端來的《〈宋會要輯稿〉證誤——〈職官〉78宰輔罷免之部》，共指出34處有誤。陳智超有撰《從〈宋會要輯稿〉出現明代地名看〈永樂大典〉對所收書的修改》。此類論文中，值得介紹的有四篇，一是沈治宏的《馮淵〈韋齋類稿〉與陳淵〈默堂集〉》一文，指出《韋齋類稿》(北京圖書館藏清抄本)是書賈從《默堂集》中取文12卷重排順序，加詩2卷，而擅改作者陳淵為馮淵，實是作偽欺人。尹波《〈讜論集〉誤收陳升之上神宗狀》一文，指四庫本《讜論集》(作者為陳次升)五卷均輯自《永樂大典》，其中卷一所收《上神宗論轉運使選用責任考課三法狀》一文，實為陳升之於嘉祐2年(1057)知諫院時所上的狀，而非陳次升。劉浦江的《再論〈大金國志〉的真偽，兼評〈大金國志校證〉》一文，指《大金國志》出于元人之手，舉出前15卷之問題，並評論崔文印《大金國志校證》(1986年，中華書局)之誤點8例、誤校2例、漏校5例、及臆度和臆改4例。陳植鏗《石曼卿詩集序》一文，指出詩集序的作者是石介而非蘇舜欽。

六、結語

典籍文獻的整理，是文史研究的重要基礎。四十年來，中國大陸的文史研究，走了不少岔路，唯獨在典籍整理方面的成果最值得肯定，然而此一成績並未為世人所重視。本文是筆者利用目前蒐集到五百餘篇整理宋代典籍文

獻的論著，所做的初步討論，希望以具體的事例，說明大陸學者在典籍文獻研究的成績，呼籲學界重視此一課題，尤期盼有更多研究，客觀地評估其成績、討論未來方向。由於資料尚待充實，筆者的意見也未成熟，在此僅就觀察所及，提出三點淺見，供讀者參考，作為結語。

一、中國大陸這四十年來整理古籍和其他人文科學的研究一樣，受政治影響，經歷過極大的變動。第一階段精心規劃、辛勤耕耘，為古籍整理的規模甚至史學研究奠下基礎，卻由于文化大革命十餘年的動蕩，使剛萌芽的學術生命受到嚴重的扼殺。及至改革開放後，古籍整理工作才得展開新歷程。這十年來，由於各方面的重視與配合，古籍整理成果輝煌。宋代重要典籍點校及影印出版者約有四百部，其中，尤以點校對知識的普及，以及學術研究，都有極大的貢獻。古籍整理工作，不僅為學術研究的發展奠下深厚的基礎，同時，藉著整理古籍傳承學術經驗，以及人才的訓練，使學術研究由空泛趨於紮實，研究領域也隨著典籍範圍的擴展及新資料的發展而擴大。因此，這十年來由于意識型態的淡化，加上古籍整理的努力，使學術研究更專精、更形蓬勃，不僅可以彌補文革十餘年的研究空疏，同時也為未來的研究發展開創新機。

二、在宋代典籍整理中，點校的成績最為卓越，也受到國際漢學界的肯定與信賴，這是中共文化政策與學術領導者一項有前瞻性的規劃。藉點校典籍廣徵資料，組織人才，不僅能訓練人才，建立學術權威，同時也能蒐集有利於共產理論的史料，真是一舉數得。大陸在歷史文獻研究各領域均有專家，加上政治環境，又有利於統一規劃及長期組織人才，從事專業性的工作，因此在點校典籍，乃至古籍整理上，成效比其他國家或地區都好，貢獻最大。不過，古籍整理，尤其是典籍點校，由於牽涉學術領域太廣，難於做到完美，因此，此項點校成果固然得到世人的喝采，也常有指出點校失誤的檢討性論文。這種具體指疵的事例，在中國大陸頗為風行，是推動學術發展的重要基礎，應予鼓勵。然而，以往大陸出版點校的古籍，多由學養俱富的知名學者負責，他們的點校成績雖然也引起一些討論，但錯誤較少。近年來，學界多藉整理典籍為培養人才的手段，此舉固然有利於學術紮根。但當老成凋謝，年輕學者的學識尚待加強之際，整個中國大陸的社會環境不變，學術界深受此一風氣影響，有急於求成的現象，以致品質每下愈況，不少學者在檢討點校時，就曾不斷提出此一弊病，這些檢討顯示大陸古籍整理已出現若干警訊，這些警訊不僅告戒大陸學者要保持點校品質，也提醒世人不能輕易相信點校的古籍。同時，為了增進點校典籍的權威性和可利用性，研究者也應與點校者有相同的責任，就各

人專業學養，對古籍點校的疑誤提出修正。

三、大陸在古籍整理上，以往由於事權統一，整理規劃周延，問題較少。但自1980年以來，受環境的影響，逐漸產生一些問題。筆者觀察近年來的古籍整理情況，發現有二個問題，值得討論：一是點校的情形有捨難求易，避開重要典籍，而急於整理次要典籍的現象。宋代重要典籍很多，但像《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宋會要輯稿》、《歷代名臣奏議》、以及范仲淹、王安石、李綱、樓鑰、真德秀、劉克莊等人的文集，蘊藏著豐富史料，都是學界公認的重要典籍，卻不見有積極整理點校的動作，不少人反而致力於若干卷數少的筆記、小說的整理，或者進行像《全宋文》、《全宋詩》等大規模的整理編纂工作。此一現象正與近年來急於求成或好大喜功的風氣有關，卻是本末倒置的做法，亟應扭轉。二是有重複標點的情況。學術研究多元化是好現象，同一專題，可以有許多人從不同角度、觀點，應用不同資料加以探討，甚至辯論，是學術研究進步的現象。典籍點校固然也可以有不同的詮釋方式，但資料如此集中，所得結果很難有極大差異，若能透過分工合作的方式進行規劃，可以減少重複，增進效果。筆者所見一書重複點校的例子有15種，如《梅溪詞》有1988年雷履平等點校，也有1989年方智苑點校本；《夢梁錄》早在1959年就收入《東京夢華錄》中，1980又見單冊點校本；《東坡志林》有1981年中華點校本，也有1983年華東師大點校本；《李清照集》有1962年點校本，1979年王仲聞校注本及1981年黃墨谷重輯本；《朱淑真集》有1985年冀勤注本，也有1986年張璋點校本；《齊東野語》有1984年張茂鵬點校本，也有1987年朱菊如等點校本；《珠玉詞》有1987年吳林杼點校本，1989年胡士明點校本；《清真集》有1981年吳則虞校注本，及1983年蔣哲倫點校本；《花外集》有吳則虞箋注本及楊海明點校本；《梁溪漫志》有1985年金圓點校本及1987年傅毓鈴點校本；《稽古錄》有1988年吉書時與王亦令二種點校本；《蘇轍集》有1987年曾棗莊點校的《樂城集》3冊，也有1990年陳宏天等人點校的《蘇轍集》；《桂海虞衡志》有1985年齊治平校補本，1986年嚴沛校注本，及1987年胡起望等人的輯佚校注本；《考古質疑》有1985年李偉國點校本及1989年陳大同校證本；《折獄龜鑿》有1988年劉俊文譯注本及同年楊奉琨校釋本。

後記：本文為筆者於1991年7月至1992年6月利用哈佛燕京圖書館及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圖書館蒐藏的部分資料整理而成的，由於資料尚待增補，意見亦未成熟，因此缺漏仍多，敬請學界同道指正。文中所記，多引資料原文，特此述明，以示不敢掠美之意。